

● 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

第五辑

周明甫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

费兴祖题

● 周明甫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5 / 周明甫主编.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4

ISBN 7-5409-2937-5

I. 中… II. 周… III. ①少数民族-古文献学-中国-文集 ②少数民族-民族语-研究-中国-文集 ③少数民族-文字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G256.1-53②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5889号

策划制作: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

总发行人: 王 庆

总策划人: 陈大利

总监制人: 文 龙

责任编辑: 陈 华

封面设计: 李文金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⑤

周明甫 主编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乡盐井村11组)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50千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409-2937-5/G·1551

定价: 24.0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傣族文字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	张公瑾(1)
我国突厥语民族古籍研究述评	张铁山(10)
女真文研究百年综述	孙伯君(26)
鄯善佉卢文书所见名称词考源	黄振华(37)
百余年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和畅想	穆鸿利(51)
女真文制字规律再探	孙伯君(60)
《故耶律氏铭石》改释数则 ... 即 实(72)	
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部分残卷介绍	王梅堂(79)
从亚述学的得失看西夏学的进展	唐 均(92)
论八思巴字的文字类型	照那斯图(114)
辽宁满文古籍整理综览	关嘉禄 佟永功(119)
先秦壮族古文字探略	梁庭望(132)
纳西东巴文实笔论	木仕华(142)
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	张景明(157)
满一通古斯语族古籍文献概说	季永海(170)

近十余年蒙古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贺希格陶克陶(184)
略述满文典籍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	沈 微(190)
满文档案的抢救开发及整理利用	赵阿平(197)
从白文古籍看白文书写系统的历史发展	王 锋(206)
东巴文源于金沙江岩画	和力民(215)
“方块布依字”在布依族宗教典籍传承过程中的作用 ...	周国炎(232)
女书方言文字源流沿革探讨简介	永 明(241)
古彝文起源问题及其研究	朱崇先(248)
蒙元时期独特的蒙汉文种混合印	孙家潭(258)

一、傣文起源的传说与傣文来源

西双版纳的傣族关于傣文的起源有种种传说：有说是一位猎人根据虫子在芋叶或荷叶上吃食留下的痕迹创造的；有说是一位做饭老人用吹火筒在炉灰上印出来的；有说是向佛祖讨来的等等。前两种说法生动形象，特别是吹火筒本来是圆形，破损之后是半圆形，这两个符号印在炉灰上组合起来，成为傣文辅音字母的基础。傣文有几种不同的形体，西双版纳傣文最终采用这种独特的形式，应该说吹火筒在炉灰上印字的说法较合情理，而且与最后一种说法也可以统一起来。最后一种传说讲到傣族、汉族、哈尼族都去佛祖居住的山洞向佛祖讨文字，汉族带的是纸，傣族带的是贝叶，哈尼族带的是牛皮。在他们向佛祖说明来意后，佛祖就分别在纸上、贝叶上和牛皮上写下同一种文字。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遇上大雨，又泅水过河。汉人带的纸被水浸湿，字迹模糊，过河后就在沙滩上打开纸晒太阳，这时河滩上来了几只鸡在纸上踩来踩去，纸晾干后就留下一些鸡爪印，汉族就拿这些鸡爪印当文字，所以，后来汉字就像鸡爪印；哈尼族带的是牛皮，到岸后大家饿了，就把牛皮烧来

吃了，所以哈尼族就没有文字。只有傣族带的是贝叶，不怕水湿，把佛祖写的文字照原样带回来了，所以傣族的文字才是佛祖原来给的文字。这个传说流传很广，虽然其中说到汉族拣鸡爪印、哈尼族烧牛皮的事纯粹是编出来的，但说傣文是向佛祖讨来的，却不是无稽之谈。因为傣文的确是通过佛教的传播从印度传来的，西双版纳傣文字母表的前 41 个字母与巴利文的字母次序完全一致。再从字母形式来看，傣文与泰文、老挝文、缅甸掸文、印度阿霍姆文和坎底文以及缅文、柬埔寨文都有共同的书写规律，它们都来自印度字母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西双版纳傣文字母在形体上又不同于泰文、老挝文、柬埔寨文以及国内的德宏傣文、金平傣文等，而是自成一体，用吹火筒在炉灰上印出来的说法也不失为一种风趣生动的解释。因为后来的傣文字母，诸如 、、、 以及 、、、、、、、 等，都是单用  和  或这两种形体的结合而组成的。西双版纳傣文字母既然自成一体，当然是这个地区傣族的独立创造的成果。这个地区的傣族人为什么会创造出这种字母形式而不照搬其他地区的文字形式，煮饭老人用吹火筒在炉灰上印出来自然是一种很有独创性的解释。当然，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西双版纳傣文字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的巴利文字母和更早的婆罗米字母。属于婆罗米字母系统的文字总数不少于 200 种，而直属于巴利文系统的字母也覆盖所有小乘佛教流传的地区，其数量也至少在 30 种以上。

人们往往不太了解巴利文字母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是文字史上一种极为特异的现象，即巴利文字母是有音无字的字母，它系统严密，元音加辅音共 41 个字母，可以 a ā i ī u ũ e o……连续念下来，而且有严格的拼写规则，但它只活在人们的口头上，没有文字形体。打个比喻，它是有影无形的，所有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都要创造一种包括 41 字母的文字来记录它。所以，佛教传入斯里兰卡之初，三藏佛典就是用僧伽罗文来记录

的。僧伽罗文也是属于巴利文系统的一种文字。由于有这种自创文字记录佛典的传统，因此，我国傣族在不同地区就创造了四种文字。这些文字都属于巴利文系统，但文字形体各不相同。西双版纳傣文是傣族自己创造的，创造这种形式的文字总得有一个根据，那么，煮饭老人发明这种文字形式，吹火筒的印子与傣文字母形体又那么一致，这个说法也就很容易传播开来了。

总之，西双版纳傣文是为记录小乘佛典而创制的一种属于巴利文系统的文字。其文字形体又带有明显的民族和地方特点，因此，西双版纳傣文既是印度文化传播的产物，又是本民族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它成了傣族文化巨大飞跃时代的一个文明标志。

二、傣文创制的多样性

国内傣文有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金平傣文和傣绷文四种文字。这四种傣文虽都来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但已经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变得各有特色，互不相认了。首先，字母形式不同，每种傣文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字体。其中西双版纳傣文与傣绷文为圆形字母，两者有几个字母完全相同，如 、、、，有几个字母十分近似。如（前西双版纳傣文，后傣绷文）、；、；、，但多数字母仍形体不同。德宏傣文为方形字母，如傣绷文的 、、、，德宏傣文与之相应的是 、、、，但多数字母形体不同。金平傣文有方有圆，还有一些尖角形，个别字母像汉字的注音字母，有好几个字母右边又向右上角倾斜延伸，形体不同于上述几种字母，风格较为特殊。其次，字母数量不等，如西双版纳傣文在巴利文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15 个字母，共有 56 个字母；金平傣文增减了几个字母，最后有 44 个字母；德宏傣文和傣绷文减少了一半以上字母，德宏傣文只有 19 个字母，傣绷文仅有 18

个字母。第三，字母表音的原则不同，西双版纳傣文和金平傣文的辅音字母都分高低音两组，即同一个音位按声调分别用两个或三个字母来表示，但德宏傣文和傣绷文的字母均已简化为一音一字母，偶有一音两个字母的，也不是因为声调的原因，所以这两种文字字母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或一半以上。这种大幅度削减字母数量，将高低音两组字母合并为一组的做法，是很富创造性的。宗教文字本来是神圣的，是极为保守的，不容许在造字特征上作任意改动。如属于同一系统的緬文、泰文、老挝文、柬埔寨文，都分高低音两组，只有德宏傣文和傣绷文的创造者竟不顾宗教传统的束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在是婆罗米字母传播史上的创举。但虽然如此，这几种文字互相间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循的。第一是有些字母变了形状，互相间仍可以识读；第二是拼写原理相同，书写时一律自左而右；第三是辅音字母、元音字母和声调符号组成音节时组合方式相同，元音字母都分布于辅音字母的上下左右，声调符号都标写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右上方；第四是文字的整体风格接近，任何人一看便很容易把这几种文字与汉字型文字或拉丁字母或阿拉伯字母区别开来。所以，这四种文字虽互有差异，但仍属于同一种文字体系。与汉字型各种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比较起来，可以说，汉字型文字都貌似汉文，但不是汉文。拿起西夏文文书来，每一个字都像汉字，但没有一个字与汉字相同。而巴利文系统的文字都互不相同，但稍加学习，即互可识读。婆罗米字母系统的各种文字在造字原理上是那么一致，但形体和字母数目又相差悬殊，各个民族都创造出特殊的形式，显示出各民族人民独特的智慧和别具一格的创造力，由此并显示出婆罗米字母变化的多样性。看来，每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区都应该有一个独立创造文字的动人的故事。

三、傣文是跨境文字

傣族是跨境民族，傣文也是跨境文字。

傣族是傣泰系统诸民族中的一员。傣泰系统诸民族在西方学者中称作“Tai”族群，我们称作傣泰系统诸民族，其中除傣族外，还包括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越南的白泰人、黑泰人，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坎底人等，也包括我国境内的壮族和布依族。这个族群的各民族都是独立的民族，但他们有共同的族源、相似的文化特征和具有明显对应规律的语言，有人称他们为“同根生的民族”（范宏贵所著书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他们互相也自认为是“比农”，即兄弟亲戚之意。傣族作为跨境民族，一方面指自称为“傣”的同族人，如缅甸的傣痕，泰国北部的傣允，泰国和老挝的傣泐，越南的白泰人和黑泰人等；另一方面也指上文所指“同根生的民族”，如泰族、老族、坎底人等。我们讲傣文是跨境文字，主要指自称傣（部分因音变成“泰”）的那些民族的文字，有时也包括“同根生的民族”的文字。作为跨境文字，是因为西双版纳傣文与泰国的兰纳文、缅甸的傣痕文相同，傣绷文与缅甸掸文相同，金平傣文与越南的白泰文相同，这几种文字都是跨境使用的，这体现了境内外傣族支系分化的复杂性和文化上的地区认同性。德宏傣文稍为特殊，只在国内流传，这是因为境外的傣绷文、掸文势力较大，阻挡了它的向外传播。印度的阿霍姆文、坎底文与德宏傣文关系较深，但相距较远，字体已变得不能认识了，这又是由于这个民族的创造能力较强所致。傣族有很多支系，西双版纳傣族自称傣仂，德宏傣族自称傣纳，金平一部分傣族自称傣端（白傣），瑞丽一带的傣族自称傣绷。此外，还有傣雅、傣拉、傣仲、傣卡等支系。西双版纳与泰国清迈、缅甸景栋为一个共同文字区，瑞丽一带傣族与缅甸掸邦是

一个文字区，金平傣族与越南的莱州、老街、山罗一带为一个共同文字区。但这几个文字区的傣族又互认为同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有几种文字，而这几种文字又都跨境分布，形成了小块分布的共同文字区，这在世界文字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说明傣泰系统诸民族都是很富于创造性的。这种同根异形的文字分布与傣民族同源分支的民族情况是大体一致的。说到底，文字仍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字也有一个环境基础，这就是它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文字不同于语言，语言是各民族自己传承下来的，语言的交配和语言的替换终究是少数情况，但文字多半是传播的。从傣泰系统诸民族文字的情况来看，在文字传播过程中，也带有本民族的独创性。正是这种民族独创性，使世界文字显得琳琅满目，处处散发出各民族创造能力的奇光异彩。

一种文字的跨境分布，对这种文字的保存和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能起到扩大交流、互相促进的作用。我国傣族在国内总共才100多万人，原来使用四种文字，一部分地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每种文字的使用范围是很有限的。但由于西双版纳傣族使用的傣文与泰国清迈的傣允文、缅甸景栋的傣痕文基本相同，我国的傣文出版物也就很容易流传到泰国和缅甸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云南民族出版社用西双版纳新傣文出版了两部傣族歌手创作的长诗《彩虹》和《流沙河之歌》，两书皆套封精装，有许多精美插图，境外傣族虽然不懂新傣文，他们也愿意学，愿意读。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之后的恢复时期，边疆日用品还比较紧缺，缅甸傣族（掸族）同胞愿意用一双胶鞋或一只脸盆来换取价值仅一元二角钱一册的诗集，可见我国傣文的出版物不仅有国内的读者，还有境外的读者。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文经书被大量烧毁，80年代初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佛寺恢复活动，可是小和尚无经可念，于是从缅甸景栋输入大量的贝叶经典，解除

了寺里和尚念经而无经书的燃眉之急。再从德宏方面来看，德宏傣文与缅甸掸文组字规律基本相同，两种文字都存在一字多音、一词多义、不辨声调等缺陷。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对德宏傣文进行了改革，新文字已克服了上述存在的毛病，使德宏傣文大大科学化了，同时，这一改革也对缅甸掸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接着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使掸文的科学化程度前进了一大步。再从金平傣文和傣绷文的情况来看，我国使用人口本来不多，金平傣文所覆盖的方言人口仅一万二千多，真正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数极少。这种文字之所以还能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越南方面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傣绷文主要使用于德宏州瑞丽县和耿马县勐定区。这种傣文在国内没有出版物，只有一定数量的佛教经典，在瑞丽县还有相当大的使用范围，如商店招牌、商品标志或产品说明等，佛教经典及一些新的印刷出版物，皆从缅甸输入。如果没有国境外较大的使用市场，这两种文字是很难延续下来的。可见一种跨境文字，它在境内外的境遇不同，可以起到内外交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互相促进的作用。在当前全世界母语危机日显危急的情况下，跨境语言与跨境文字往往能在境内外的交流中增强活力，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四、傣文传播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文字跟着宗教走”是世界性的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天主教传播的地方，同时带去了拉丁字母；在东正教传播的地方，带去了基利尔字母；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地方，带去了阿拉伯字母；在佛教传播的地方，带去了印度字母。但这种情况也不是毫无例外的，首先是汉族，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到南北朝形成第一个鼎盛时期，隋唐形成第二个鼎盛时期。此后虽时有起落，但一直长盛不衰。但印度字母随佛教传到西域时就停步不前了，

没有能跟随佛教传到中国内地来。这是由于我国有很深厚的文化根基，汉字有极为牢固的社会基础，更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容易接受另一种外来的表音文字。于是，中原地区在吸收佛教文化的时候，深奥的佛教教义就用汉字把它消化了。我国也吸收了印度文字的某些分析原理，从而产生反切、36字母和音韵学，但印度文字的形式却被挡住了。这是文字不跟宗教走的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即文字形式传进来了，但宗教却没有能传进来，这就是金平傣文和越南白泰文的情况。云南金平县有傣族约一万五千多人，分属于傣罗迷（黑傣）、傣端（白傣）、傣仂和曼仗傣四个支系。不同支系的语言文字情况皆有差别：黑傣和曼仗傣有语言而无文字；傣仂的语言文字与西双版纳相同，他们同样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有西双版纳老傣文的经书；白傣人（即傣端）约一万多人，则使用另一种傣文，这就是金平傣文。这部分傣族与越南的白泰人一样，使用相同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也属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其中已经过重大的改造，应属于印度字母的中南半岛变体。中国金平的白傣人与越南的白泰人接受了印度字母的形式，但他们不信佛教，仍继续信奉他们的原始宗教，这个现象极为特殊，值得研究。

分析我国金平白傣人与越南白泰人的情况，他们确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区距离傣族大聚居区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及孟连、耿马都较远，而且与这些地区的傣族属于不同支系，因此很难接受小乘佛教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南面是越南的大乘佛教地区，大乘佛教与大多数傣族信仰的小乘佛教属于不同教派。由于大乘佛教势力的影响，也使小乘佛教更难渗透到这个地区的傣族中来，于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就照原样保存下来了。那么，他们怎么能创造出与其他地区傣族属于同一类型而又自有特点的文字呢？细加考察，这是由于他们与其他地区傣族说着同一种语言而又存在方言差别所致。由于是同

一种语言，出于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接受同一类型的文字就比较容易，又因为存在方音差别，他们又根据其他地区傣族所使用的傣文的规则，另创造一套自己的文字，这是顺理成章的。

金平白傣人与越南白泰人使用一套属于印度字母体系的文字，但又不接受小乘佛教的影响，这说明“文字跟着宗教走”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由于情况特殊，也会出现例外，这是世界文字流传中的一个饶有趣味、十分特殊的现象。

我国现有 7 个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裕固族。突厥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先后主要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不同类型的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作、记录和保留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是我国光辉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古籍文献的文字类型，结合民族的社会历史，突厥语民族的古籍可以分为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 3 部分。

一、古代突厥文

古代突厥文是我国历史上曾活动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国（552～744）和回纥汗国（744～840）以及高昌回鹘王国（840 年以后）使用的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此外，这种文字也曾为古代居住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所使用。

古代突厥文还有其它的名称。从外形上看，它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有人称其为古代突厥如尼文。从这种文字的发现地来看，因其主要碑文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鄂尔浑文、

叶尼塞文、鄂尔浑—叶尼塞文、西伯利亚文。从这种文字的使用时间上看，它用于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时期，所以又有人称它为前伊斯兰文。以上有关古代突厥文的各种名称多见于外文书刊，我国目前一般统称为古代突厥文。

关于古代突厥文的起源，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古代突厥文字母中有 23 个是来自阿拉美文，还有一些是源自古代突厥语部落使用的氏族或部落标记及表意符号。关于古代突厥语部落何时何地开始接触阿拉美文并用它作为古代突厥文原型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1）认为七河一带曾是粟特人的居住地，同时，在 6~7 世纪时，那里也是西突厥的统治中心，所以很可能是在七河地区接触到阿拉美文的。（2）根据中国史书中关于突厥阿史那氏先族的传说，古代突厥语部落采用阿拉美文始自高昌一带。（3）认为可能是 6 世纪下半期木杆可汗在位，对中亚进行征服时接触阿拉美文的。从目前保留的古代突厥文古籍来看，古代突厥文的使用时间可以定于 7~10 世纪之间。

古代突厥文古籍主要有碑铭、写本和题记 3 类。按照俄罗斯突厥学家 S·G·克利亚什托尔内的看法，古代突厥文古籍可以再从以下角度进行分类：

1、按地区可分为 7 群碑铭：（1）北蒙古碑铭（即一般说的鄂尔浑碑铭），除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墩欲谷碑、翁金碑、阙利啜碑、色楞格碑、哈喇巴拉哈逊碑、苏吉碑等著名的碑铭之外，还有一些小碑；（2）叶尼塞河流域碑铭（已发现有 70 多个）；（3）勒拿—贝加尔地区碑铭群（包括摩崖上的 37 处铭文）；阿尔泰地区碑铭；（5）新疆碑铭（吐鲁番古建筑墙壁上 4 处铭文及在米兰、敦煌发现的几个重要文献）；（6）中亚碑铭群（包括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地区的碑铭）；（7）东欧碑铭（顿涅茨河、多瑙河流域发现的碑铭）。

2、按历史—政治可分为与地区分类相适应的 7 类：（1）东

突厥汗国碑铭（8世纪）；（2）黠戛斯汗国碑铭（7~12世纪）；（3）骨利干部落联盟碑铭（8~10世纪）；（4）西突厥汗国碑铭（8世纪以前）；（5）蒙古高原回纥汗国碑铭（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叶）；（6）新疆回鹘汗国碑铭（9~10世纪）；（7）裴奇内格部落联盟碑铭。

3、按体裁类别可分为6类：（1）历史传记碑铭（突厥、回鹘和黠戛斯贵族死后或在世时立的纪功碑，由他们的至亲或本人撰写）；（2）墓志铭性质的抒情体碑铭，属于这类体裁的有叶尼塞河流域和七河流域的墓碑；（3）刻在摩崖、建筑物上的纪念题词；（4）宣传魔法和宗教的文献；（5）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法律文书；（6）日用品上的题记。

从上面克利亚什托尔内的分类中，我们对古代突厥文古籍的分布、历史时期及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国汉文史籍很早就对古代突厥文及其古籍有过记载。如《周书·突厥传》曾记载“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记载：“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旧唐书》卷一九四记载：“阙特勤死，（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但直到19世纪末以前，古代突厥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字，其结构如何，世人并不清楚，它成为一种无人知晓的“迷”一样的文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外国考古队、探险队在中亚各地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上述古代突厥文古籍，并陆续发表和出版了有关的研究成果，一时形成了世界各国争先恐后搜集和研究古代突厥文的热潮。但我国的古代突厥文古籍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时已落后于国外，偶尔有几篇文章，也只是简单介绍性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古代突厥文古籍的研究也同其他民族古籍研究一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综观我国